

# 唐朝前期移民河西考

杨作山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唐朝前期, 为巩固西北边疆, 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 在河西地区建立屯牧制度, 进行移民实边。同时, 设立羁縻府州, 安置各族降户; 鼓励商业贸易, 招徕西域商旅, 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

**关键词:** 唐朝; 河西; 移民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0491(2007) 02- 0081- 05

收稿日期: 2006- 05- 23

**作者简介:** 杨作山(1962- ), 男, 土族, 甘肃天祝人,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教学与研究。

唐朝前期, 在平定薛举、李轨割据政权后, 为北防突厥, 西御吐谷浑、吐蕃, 锐意开发河西, 从唐太宗统一中国到玄宗统治的百余年间, 唐朝通过移民实边, 屯田、屯牧, 安置少数民族, 鼓励商业贸易等一系列措施, 恢复和发展河西地区农牧业生产。这一时期, 河西地区社会相对安定, 民族关系比较和睦, 农桑繁盛, 士民殷富。

## 一、建立州县机构, 恢复农业生产

唐朝在平定李轨割据政权后, 在河西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行政制度。唐武德二年(619), “平李轨, 置凉州总管府, 管凉、甘、瓜、肃四州。凉州领姑藏、昌松、番和三县。三年, 又置神鸟县。七年, 改为都督府, 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贞观元年(627), 废神鸟县。总章元年(668)复置。咸亨元年(670)为大都督府, 督凉、甘、肃、伊、瓜、沙、雄七州。上元二年(675), 为中都督府。神龙二年(706), 置嘉麟县。天宝元年(742), 改为武威郡, 督凉、甘、肃三州。乾元元年(758), 复为凉州”。睿宗景云二年(711), 唐又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 并设立节度使。河西道除凉、甘、肃、瓜、沙外, 还包括西域广大地区。

玄宗开元年间, 为防止吐蕃、突厥对河西地区的侵扰, 增设朔方、陇右诸节度使, 重新部署边防兵力。河西节度使统领九军二守捉, 分布在凉、肃、瓜、沙、会等州, 治所在凉州。陇右节度使统领十军三守捉, 分布在鄯、廓、洮、河等州, 治所在鄯州。天宝元年(742), “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 统赤水、

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 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 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 治凉州, 兵七万三千人”。<sup>[1](卷二一五)]</sup>天宝十三年(754), 哥舒翰又在黄河九曲一带设置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五军, 新设各军不在节度使固有兵额之内。屯军平时耕牧, 战时出征, 许多屯军后来成为当地屯户。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 河西地区汉人多为原来军户之子孙。州县制度的确立, 军备制度的完善, 较好地发挥了稳定河陇地区的作用。

《元和郡县志》云: “凉州武威。中府。开元户二万六千一百六十五, 县一十五。”

《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载: 武威郡领姑藏、神鸟、番禾、昌松、嘉麟五县, 有户 25 693, 口 128 192。张掖郡领张掖、删丹二县, 有户 6 639, 口 23 304。酒泉郡领酒泉、福禄、玉门三县, 有户 2 106, 口 7 912。晋昌(瓜州)郡领晋昌、常乐二县, 有户 1 167, 口 3 800。敦煌郡有户 6 395, 口 32 234。

《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四》载: 天宝年间, 凉州武威郡有 22 462 户, 120 281 口; 沙州敦煌郡有 4 265 户, 16 250 口; 瓜州晋昌郡有 477 户, 4 987 口; 甘州张掖郡有 6 284 户, 22 092 口; 肃州酒泉郡有 2 230 户, 8 476 口。

按《通典》的统计, 当时河西地区共有 42 000 户, 195 442 人。而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 天宝年间, 河西各州共有 35 718 户, 172 086 人。平均每户约 5 人。尽管各种典籍对唐代河西地区户口的统计不尽相同, 但出入不大。

此外,《旧唐书》卷四十《地理三》:凉州中都督府条还载:“吐浑部落,兴昔部落,阁门府,皋兰州,庐山府,金水州,蹕林州,贺兰州。以上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苾、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共有户五千四十八,口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加上这一数字,河西地区至少有 40 766 户,189 298 人。”

除国家编户外,河西地区还有大量屯军。唐朝屯田始于高祖武德年间,“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缗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挽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sup>[12](卷一九六)</sup>调为戍卒的山东丁男可能是河西地区的最早屯军。武后垂拱二年(686),陈子昂在巡视河西后上疏:“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但以人功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得。”<sup>[13](卷八)</sup>甘州地区土壤肥沃,灌溉便利,但因缺乏劳力,未尽地利。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长安元年(701),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他在凉州南北分置和戎城和白亭军,控其要冲,拓州境二千余里,“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一缗余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sup>[14](卷二〇七)</sup>神功元年(697),武后诏“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仍兼校河西营田事。”<sup>[15](卷九十三)</sup>以宰相知河西营田事,可见武后对河西屯田之重视。《唐六典》卷七《屯田郎中》载有玄宗开元年间全国屯田数目,当时“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其中河西道共有军屯 154,包括赤水 36 屯,甘州 19 屯,大斗 16 屯,建康 15 屯,肃州 7 屯,玉门 5 屯,安西 20 屯,疏勒 7 屯,焉耆 7 屯,北庭 20 屯,伊吾 1 屯,天山 1 屯。在这 154 屯中,大约有百屯在河西走廊境内,占全国屯数的 10%强。

河西屯田还有民屯,土地属屯军。民屯是把土地按一定数量交给征发来的丁夫耕种,名为屯丁、屯户或营田户。他们实际上是均田制之外的自耕农。屯户被包括在屯军人数之内,抑或隶属国家编户,目前尚无定论。河西屯户中还有一些发配来的犯人。如玄宗开元九年(721)五月“原见囚死、流罪随军效力,徒以下未发者”。开元十六年正月,“许

徒以下囚保任营农。三月辛丑,免营农囚罪。”<sup>[4](卷五)</sup>

唐政府为加强对河西编户的管理,还括还逃户,设置并健全乡、里建制,以使流散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来。《长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称:甘、凉、瓜、沙等州“以水田稍宽,百姓多悉居城,庄野少(人)执作。沙州力田为务,小大咸解农功。逃进投诣他州,例被招携安置”。于是官府下令括还沙州逃户,并对其实行种种优抚,努力使他们回到原有的土地上。但是,唐前期逃户问题一直禁而未绝。《唐会要》卷 85《逃户》载天宝八年正月敕令云:“其有逃还复业者,务令优恤,使得安存。纵先为代输租庸,不在酬还之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河西人口虽有所增加,但逃户现象时有发生。“以开元之承平,而户口犹不及汉之盛时,唐兴以来,治日少而乱日多也。”<sup>[1](卷二一四,胡注)</sup>唐前期对河西人口增殖作了很大努力,缓解了劳力严重不足的矛盾,但未能彻底改观。

## 二、抚御各族降户,安置流亡汉民

河西地区历来为华戎杂居之地,所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sup>[15](卷六三)</sup>,即指河西地区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国”。自战国至秦,河西地区为月氏、乌孙居地。匈奴破月氏,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莽曰张掖。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sup>[16](卷六)</sup>汉武帝在河西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东汉时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sup>[17](卷八)</sup>。前凉、后凉、北凉、北魏统治时期,大量少数民族入居河西,使这一地区的民族成份更为复杂。隋大业三年,“炀帝西巡,次焉支山。高昌、伊吾使及西番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后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遣兵戍守。“诸蕃慑惧,朝贡相续。”<sup>[18](卷六七)</sup>随着丝绸之路的通畅,中原汉商和西域胡商纷纷入居河西。《隋书·食货志》云:“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可见河西地区胡商之多。

唐太宗平定突厥后,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及西域诸胡纷纷内附。唐朝通过设置都护府、羁縻府州,册封,和亲,封爵,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等措施对少数民族进行羁縻统治。

武德三年(620)五月,“以秦王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 诸军事、凉州总管,其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并如故。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sup>[1](卷一八七)</sup>同年九月,“突厥莫贺咄设寇凉州,总管杨恭仁击之,为所败,掠男女数千人而去。”<sup>[1](卷一八八)</sup>六年(623)六月,“丙寅,吐谷浑内附”<sup>[1](卷一九)</sup>。处之于河西地区。

武德八年(625)八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蓄被野。”<sup>[1](卷一九一)</sup>太宗贞观元年(627),“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性粗暴,左右百余人,皆无赖子弟,侵暴百姓;又与羌、胡互市。”赐幼良死。<sup>[1](卷一九二)</sup>河西地区诸族杂居,民族矛盾尖锐。唐与少数民族间存在着官方的和民间的互市贸易。

贞观三年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戊午,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帅众来降。”<sup>[1](卷一九三)</sup>是年,“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sup>[1](卷一九三)</sup>贞观年间,唐曾收纳流亡汉人和归降突厥 120 余万人,安置于边地,其中或有部分安置于河西,但人数与地点很难稽考。

贞观四年,又有“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sup>[1](卷一九三)</sup>六年(632),“十一月,辛巳,契苾酋长何力帅部落六千余家诣沙州降,诏处之于甘、凉之间,以何力为左领军将军。”<sup>[1](卷一九四)</sup>同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sup>[1](卷一九四)</sup>《唐会要》则载内附者达三十四万口。<sup>[1](卷一九四)</sup>他们大多被安置于河西、陇右。但贞观九年(635),“春,正月,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sup>[1](卷九十八)</sup>高宗总章二年,唐在打败高丽后,将其数万余众徙居内地,其中一部迁至凉州。<sup>[2](卷四)</sup>

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浑虚实。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sup>[1](卷二〇一)</sup>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及弘化公主率残部退至青海之北、祁连山南麓一带。咸亨元年(670)四月,唐高宗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以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二人为副,将兵十余万,讨伐吐蕃,且援送诺曷钵还故地。八月,大非川之役,唐军大败,死伤殆尽。诺曷钵率余部数千帐徙居凉州南山(今祁连山东端北麓)。咸亨三年(672)二月,诺曷钵率部徙居鄯州浩门河流域,但因山川狭窄,并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遂徙灵州。唐设安乐州居之。自大非川之战后,吐谷浑余部多至凉、甘、肃、瓜、沙诸州附唐,有的甚至远徙灵州。7 世纪末,吐

谷浑人不堪忍受吐蕃无休止的征发和繁重的赋税劳役,大批逃亡唐朝,就近降附河西等地。

武后长寿元年(692)二月,“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分置十州。”<sup>[1](卷二〇五)</sup>圣历二年(699)四月,吐蕃将“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太后命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sup>[1](卷二〇六)</sup>赞婆率领所部守凉州东南之洪源谷。是年七月,又有“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sup>[1](卷二〇六)</sup>但其所投之地不明,可能仍在河西、河湟一带。此后,又有不少吐谷浑部落投附唐朝,或被唐掳掠而来。

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四月,吐蕃首领张甘松投唐,授员外镇将,留宿卫。<sup>[10](卷九十五)</sup>是年九月,有吐谷浑部落至沙州内附。《通鉴》云:“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九月,壬申,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sup>[1](卷二一二)</sup>

此外,凉州有回纥、契苾、思结、浑诸部 5 048 户,17 212 口。其版籍不上户部。

九姓胡是西胡之一。唐武德元年(618),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建牙千泉(碎叶附近),役属九姓胡。显庆四年(659),唐灭西突厥,在西域置羁縻州府。九姓胡改宗唐朝。神龙三年(709),大食灭安国。先天元年(712),大食灭康国。天宝十年(751),怛逻斯战役后,石国丧失独立,九姓胡又改宗大食。自 1916 年伯希和发表《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sup>[11]</sup>以来,中外学者对九姓胡东方聚落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明显进步。探讨所及,涉及六胡州、沙州、凉州等地。

隋末唐初,九姓胡中的石、康两姓,各由首领率部移居伊州和鄯善。河西重镇凉州,是九姓胡商必经之地。据《魏书·西域传》“粟特”条载,早在 5 世纪中期,“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唐初,流寓凉州的九姓胡商旅,聚族而居,盘根错节,尤以安氏一族最著。河西李轨政权的兴衰便与凉州胡人有关。《通鉴》云:“李轨吏部尚书梁硕,有智略,轨常倚之以为谋主。硕见诸胡浸盛,阴劝轨宜加防察,由是与户部尚书安修仁有隙。”修仁兄兴贵,仕长安,表请说轨,轨不听,于是“退与修仁阴结诸胡起兵击轨,轨出战而败,婴城自守”。“兴贵执之以闻,河西悉平。”<sup>[1](卷一八七)</sup>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



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sup>[1](卷二一九)</sup>仅此可以看出九姓胡在凉州举足轻重。另敦煌从化乡,高昌崇化乡的杂居胡姓民户,均按乡、里编籍,计丁授田。他们以务农为主,是一批胡姓的庶民。

唐宋之际,甘、凉、瓜、肃、兴元(今宁夏银川)、青唐城(今青海西宁)诸地均有大批来自阿拉伯、中亚的商旅居留。《西湖游览志》断言:“宋代穆斯林之来中国,留居贡道不归者,早在唐、宋已为数甚多。”在唐代,住唐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享有法律上的以及宗教上的照顾。《唐律疏议》卷六云:“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代“波斯、阿拉伯人亦由陆路进入中国,在凉州、长安、洛阳等地贸易,且有远至辽东者。”<sup>[12](P360)</sup>《甘宁青史略》也说:“终唐之时,唯甘、凉、灵(今宁夏灵武市)有回族。”大批胡商进入河西经商,对促进河西地区商贸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唐政府在平定河西后,较好地处理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河西地区与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为后来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 三、鼓励商业贸易,招徕四方商旅

唐太宗贞观年间,平定高昌,建立安西都护府,中西交通逐渐顺畅,与西域诸国的往来趋于频繁。唐太宗在打败西突厥后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鼓励商人贩运。中西贸易有贡赐、民间互市、地方机构参与等形式。商人大多来自突厥、吐蕃、回纥、大食、波斯及西域等国家和地区。官方贸易虽不以河西为始发地,但各国、各族贡使频繁经过河西,促进了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贸易较之官方贸易更显频繁。当时,凉、甘、肃、沙、瓜州各地都设有市场,商品云集。在河西地区的丝绸贸易中,胡商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河西及周边地区民族众多,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方式有别,民族间的贸易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唐与少数民族间频有战争,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并未因此而断绝,即便在敌对政权之间,战争间歇也多次互市。吐谷浑、党项、突厥、吐蕃都曾请求互市,无一例外。在双方和好的时期,更是“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呈现出“蕃汉非常快乐”的局面。<sup>[13](卷四十)</sup>粮食贸易是河西贸易的基础,民族间的互市是河西贸易的重要内容,河西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其它过境商品的贸易是河西贸易繁荣的标志。除了来自西域的各族商队,河西及其附近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贸易活动,

也在河西贸易中占有一定地位。农牧产品可以满足交通要上行旅的需求,供与需的吻合是河西商业繁荣的基本条件。

唐前期,在河西地区的贸易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凉、甘、沙、肃州等贸易中心。凉州是当时的河西首府,也是最大的商业都会。唐天宝以前,长安为世界第一国际都市,洛阳、成都次之,其它如太原、荆、扬、幽、广、汴诸州,商业亦盛。凉州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其繁盛仅次于荆、扬,而在幽、广之上。贞观初,玄奘在路过凉州时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sup>[14](卷一)</sup>元稹在《西凉伎》一诗中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sup>[15](卷二十四)</sup>不仅反映了当时凉州的繁荣景现,同时也反映了胡汉、蕃汉人民和睦相处,互市交通的一面。

杜佑《通典·食货志》云:“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新五代史·吐蕃传》也说:“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sup>[16](卷七十四)</sup>以贩运丝绸及丝织品为业的西域胡商,纷纷来到凉州等地经营丝绸贸易。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写道:“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sup>[17](卷一九九)</sup>这里的十万家或许有所夸大,但足以说明凉州确为市况富盛,人口众多,胡汉杂处的大城。开元二十二年,唐蕃双方在赤岭会盟并树立界碑。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与吐蕃将乞力徐约和,撤去树栅、守捉,于是“吐蕃畜牧被野”。<sup>[2](卷一九六)</sup>开元末年,吐蕃人已在天梯山下和南山山脉诸纵谷中游牧。

甘州是河西第二大城,也是主要产粮区。从贞观年间直至开元、天宝之际,河西地区胡商麇集,道路相继,大批胡商专程到甘州贸易,有些还定居于此。

沙州为河西交通枢纽,是丝绸之路西段三条路线的总始发点,其贸易状况不亚于凉、甘二州。敦煌与吐鲁番文书中,有许多关于兴生商贾在沙、瓜二州进行贸易的记载。《唐开元二年(732)三月瓜州、沙州给石染典过所》及《唐开元二一年(733)正月西州百姓石染典买马契》两件文书,为我们再现了西州商人在瓜、沙两地进行贸易活动的情况。据《沙州图经》记载,敦煌周围设有清泉、白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21个驿站、邸店。其所载“石城镇”是外国商人聚居之地。驿站周围

往往形成商品集散地,也有民办的客店、商铺和手工业作坊等。唐政府还在较大的客商聚集地设市,委派市令管理,查禁“违禁品”,征收商税。敦煌以西百里的兴胡泊,则是通过玉门关道,往返胡商居止之地。另外,敦煌还是大批康国商人聚居地。《旧唐书·地理志》云:“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看来,敦煌的贸易可能比凉、甘二州更为兴旺。

肃州也是河西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但较凉、甘、沙稍逊。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云:“琵琶长笛曲相合,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犂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在河西重镇这次胡味极浓的酒席上,有胡乐、胡歌、交河美酒。

见刘昫《旧唐书》(卷40)《地理三》。关于河西节度使设置的时间,诸史记载不同。《唐会要》卷78节度使条云:“景云二年四月,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此始有节度之号,遂至于今不改焉”。但《资治通鉴》卷210,睿宗景云元年(710)十二月条云:

参考文献:

[1]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陈子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6] 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9] 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0]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94.

唐代,河西地区的贸易仍以丝绸中转为主,西域胡商携带大量珍宝到河西求购丝绸,汉商则运丝绸至河西进行贸易。大批胡商客居河西,促进了河西瓷器、珍宝、药材、粮食和驼马的交易。天宝末,进士鲍防在《杂感》一诗中描述西胡入贡的盛况时写道:“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贡葡萄酒。”<sup>①171(卷三〇七)</sup>

如上所述,河西及其周边地区除了过往和定居的波斯、大食等国“胡商”、“胡贾”外,还分布着吐蕃、吐谷浑、党项、突厥、回鹘等众多少数民族,民族间的贸易活动是河西商品经济的重要内容;不同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构成了西北地区民族迁徙、融合的经济基础。

“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太平寰宇记》、《通典》卷32、《新唐书·兵志》作景云二年,而《新唐书·兵志方镇表》则为景云元年。

九州: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皆李轨所据之地。

[11] 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A].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C].上海:商务印书馆,1995.  
[12] 方豪.中西交通史[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  
[13] 董诰.赐吐蕃玺书[A].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4]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 元稹.元氏长庆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6] 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7]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A].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方建春]